

# 中美关系“三十而立”，当互为镜鉴

■新华时评

美国耶鲁大学中国史学家史景迁考证,有据可查的中美第一次接触发生在1784年,一艘名为“中国皇后”号的美国商船停靠中国广州港。是年,美国独立战争正式结束;中国清代正处“康乾盛世”。

故人如有知,当惊世界殊。200多年后,美国早已是世界头号强国;古老的中国经历维新与共和、革命与建设、改革与开放的洗礼后,开始进入新的盛世。

美国总统奥巴马15日至18日对中国展开首次国事访问,正是中美梳理检视两国历史关系、展望定位新时期战略关系、明确各自核心利益、共同应对全球问题努力的重要一环。

奥巴马这次访华,正值中美建交30周年。从在冷战大背景下握手开始,中美关系已全面拓展至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层面,中美交往的广度、深度、速度、规模、体量以及在国际关系上的重要性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元首互访,是双边关系健康发展的最高表现形式。奥巴马是首位在首个任期第一年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他对中美关系重要性的

理解不言而喻。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何汉理近日透露,以“变革”为旗号的奥巴马上台后曾明言,唯有加强沟通和合作的对华政策“不能变”。

中方同样高度重视中美关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多个场合指出,一个良好的中美关系不仅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

鼎有三足,然后持稳。健康的世界经济、和平的国际环境、良好的全球生态,正是中美共同战略利益诉求之“鼎立”三足。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这决定两国有着广泛共同利益和广阔合作空间。经过多年往来,中美关系的利益渗透已深化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步。而金融危机、国际安全、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也亟须中美会同其他国家携手应对。

世界经济复苏还显脆弱。美国是危机“发源地”,中国也倍受其害。由于应对得力,中国正在逐步摆脱危机,并成为带动全球复苏的主要引擎,美国也于今年第三季度恢复增长。目前,复苏虽有起色,但根基尚不稳固;金融危机刚走出谷底,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要巩固复苏态势,推动

平衡有序发展,真正挽救世界经济于危局,尚需中美两国秉持互利共赢理念,合力应对。

国际安全形势难言安全。美国以“反恐”为名发动的两场战争远未结束,其“反恐”策略影响中东、南亚,乃至全球

局势。核不扩散问题也是中美两国共同的重关切,加强世界核不扩散体系仅靠一国不可能实现,沟通协调立场必不可少。

全球变暖牵动全球人心。本月初,40多个小岛屿国家代表在巴塞罗那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大会上警告,拖延解决全球变暖将使他们的国家面临“灭顶”之灾。美国是全球最大的人均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是新兴经济体,其减排努力关乎世界,备受瞩目。

奥巴马这次访华,正是中美就这些全球问题达成理解和共识、探索应对全球问题的契机。奥巴马中国行之所以引来海内外关注,在于中美之间是良性互动、谅解合作还是矛盾分歧、相互对抗,牵动时局人心。正如美国国际战略专家布热津斯基今年1月在纪念中美建交30周年研讨会期间所言,中美关系已经成为全球政治和经济稳定的重要力量。

当然,任何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都不可能臻于完美。中美双方在贸易、人民币汇率、美元

地位、减排、政治军事互信等议题上仍存摩擦和异议。不过应该看到,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问题和分歧的存在,反过来给进一步加深对话、扩大交流、提高合作层次创造了契机。

今年7月,中美经济对话机制“升级”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中美两国元首半年间两次在二十国集团伦敦金融峰会和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会晤,均释放出两国着力推进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关系的诚意和努力。

今年7月的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奥巴马致辞时援引中国“亚圣”孟子的一段话“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希望中美共同开辟一条通往未来之路,避免猜疑和分歧堵塞道路。

如何减少猜疑和分歧?早于孟子的中国“圣人”孔子或能给出一个回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达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要成就自己,需成就别人;通达了世界,也就通达了自身。

以人生喻,中美关系“三十而立”,甫进入成熟期,唯有互相尊重、互为镜鉴,方能同舟共济、合作共赢。这既是中美两国民众之幸,也是中美对构建和谐世界的贡献。

新华社记者

## 不能把“钓鱼执法”的概念泛化

【编者按】

关于深圳社保局涉嫌钓鱼执法一事,本版昨天发表了一组评论文章,其立足点都倾向于认为“存在钓鱼执法嫌疑”。今天的这篇文章,虽然观点迥异,但我们认为它同样很有价值,所以一并刊登出来,以为读者提供另一个观察此事的角度。

最近,深圳市社保局暂停了7家定点医院的社会保险定点资格,其中3家被暂停资格12个月,另外4家被暂停3个月。针对社保局的调查行为,社康中心称之为“钓鱼执法”。社保局对此回应说,此举只是“依据合同约定进行管理”,绝非行政执法。(11月17日《中国青年报》)

那么,深圳市社保局到底存不存在“钓鱼执法”呢?从执法手段看,上海钓鱼事件的执法者雇用或纵容“钓头”、“钓钩”,允许他们设陷阱让无辜司机中招。而当这些司机上当受骗后,需交纳巨额罚款。这些罚款,其中相当部分在执法人员、“钓头”、“钓钩”之间按一定比例分配。但深圳社保局的执法却并不像上海钓鱼这样存在不法利益链,没有分赃行为,而只是社保局执法人员扮患者前去暗访。

更重要的是,上海钓鱼产生的社会效果是非常恶劣的,

它会逼迫善良的人们变得麻木不仁,更让执法成了捞钱的代名词。相比之下,深圳社保局的执法行为不但不会使广大持卡人感到为难,还会使那些企图以不法手段骗取国家财物的医院受到处罚,从而有效避免医保资金被套取,这是有利于医保资金用到真正患者身上的。

正是基于以上几点,我认为深圳社保局的执法行为不是钓鱼,我们不能将“钓鱼执法”的概念泛化,拿来任意扣帽子。事实上,当前持卡人和医疗机构套用医保资金的事情比比皆是。有人甚至拿医保卡去买滋补药、购物。之所以会这样,是因我国医疗保险分为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两部分,前者主要用于住院费用的支付,后者主要用于门诊。现实中,总有一些持卡人在这上面钻空子,想方设法把医保卡变成“购物卡”;而一些医院,则总是挖空心思去套取统筹基金。

在这种情况下,社保局采用暗访方式取证,是非常有必要的。2005年,深圳曾发生一起轰动全国的“天价医疗费”事件。患者谢少侠因心脏衰竭在深圳人民医院住院119天后病故,耗去费用高达120万元。有关账单显示:患者1天竟被抽了26次血;某一天被抢救60次,其实只有17次。医院为何要犯这样的低级错误?还不是为了套取医保基金。试想,如果当初社保部门监管有力,这家医院还敢这般胡作非为吗?

(陈光明)

## 武大撇下病危教授输掉了道义

■今日视点

11月16日,网上出现一篇帖子称,武汉大学的著名教授、设计学院院长张在元博士两年前患上罕见的神经元传导障碍,已经病危,武汉大学竟派人当着不能言语、靠呼吸机维持生命的张在元宣布:终止其聘用合同,停止提供医疗费和住房。

(《广州日报》11月17日)帖子发出来之后,网友观点呈现两极,一种认为武汉大学这样做很没有人情味;另外一种认为武汉大学已经尽了责任,不该过分苛责。但总体来看,谴责的语言多于理解的声音。对此,武汉大学的解释是:张在元教授是非

全聘用,其人事关系不在学校。2009年4月30日,张在元教授与学校的聘任合同到期,自然终止。学校在合同中明确约定薪酬中已经包含医疗保险等费用。对争议问题,建议张教授及其近亲属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有关劳动争议问题。

确实,武汉大学没有义务为每个老师养老送终,况且武大已经为张教授垫付了60多万的医疗费,继续下去,谁也不知道还要垫多少。武汉大学是非营利性的,其经费来源主要是政府拨款,也就是说,是纳税人的钱。纳税人的钱,主要还是应该用在教育事业上。

但从道义上讲,病榻前

终止合同,的确是很不近人情,尤其是一所著名大学,如此做法,更让人难以接受。而一句“建议张教授及其近亲属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有关劳动争议问题”,也显得非常傲慢。

大学,不同于一般的企业。它的特殊性,就在于育人。我们教育学生要谦虚,要有爱心,要感恩,要讲诚信,等等。正人者,先正己。教育者应该先受教育。武汉大学的伦理学、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等学科,都是国家重点学科,不知武汉大学在解除和张教授的劳动合同之前,是否征询过这些专家的意见。

一个大学教授,除掉岗位津贴,每个月也就2000多元

的工资。我想,这个负担,对武汉大学来说,各级领导少公款吃喝几次就足够了。如果学校实在拿不出这笔钱,把道理讲清楚,在全校募捐,武汉大学共有5万多名在校学生,有教职员工近1万人,我想募捐的款额支付张教授的工资应该是绰绰有余的,而且还起到了对师生员工的教育作用。

武汉大学的傲慢,恰恰体现了行政化了的弊端。这再一次提醒人们,学校不应该是官场,不应该以官场的规矩来处理相关事宜。学校要教书育人,应该恢复教授治校,应该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德高为师,身正为范,这样才能最好地传道、授业、解惑。(叶雷)

## “编制”成了悲喜的分界线

■第二落点

武汉大学解释,张在元教授非全聘用,因此不能享受校内教职工住房及公费医疗等福利。说白了,也就是张在元教授没有“编制”。这无疑是校方“榻前解聘”的依据所在,也是引发舆论混战的导火索。

以张在元教授在学界的地位以及对学校的贡献,尚且不足以谋取一个名正言顺的“编制”,这样的细节足以使人惊诧。在高额的医疗费面前,“编制”的含金量被极端放大。张在元教授的潸然泪下以及其亲属的拍案而起,是对学校的做法表示不满——他们认为,比起张在元教授所做的贡献,他没有享受到应有的福利。然而转念一想,面对同样的悲剧,那些既没有“编制”也缺少实力的普通人,究竟如何应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孱弱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是否足以成为他们最后的救命稻草?

大家都知道,公务员目

前的医疗保障是最健全的,倘若再加上形形色色的“编制”的各类其他群体,医疗资源的大部分就与那些“编制”外的群体隔绝了。张在元教授固然可以凭借自身威望与影响对此表达不满,但更多的是面对同样的状况,怕只能是欲哭无泪,望“编制”而兴叹。

近日,上海师范大学对10所高校1641名90后和80后大学生的调查显示,国内大中小型企业中大学生最想去的工作单位。从追捧公务员岗位,到向往国有大中型企业,疲于奔命的年轻人在现实面前,将择业过程中的“经济人理性”展现得淋漓尽致——他们不是在追求事业,而是在谋求“编制”。面对未来不可预知的变化,拥有“编制”,就意味着拥有了一个避风港,就意味着可以少一些张在元教授式的困境与挣扎。不是现在的年轻人日益懒惰,而是现实教育他们渐趋“理性”,这样的状况不由得令人一声长叹。

(赵志疆)

## 单位保障应尽快转向社会保障

■第三只眼

武汉大学解聘病危教授折射了当前部分国有单位职工三种不同的医疗保障待遇。一种是所谓的“正式在编职工”,享受公费医疗;一种是聘用职工,但在合同期内享受部分医疗费报销待遇;另一种是聘用职工,但单位不为其承担任何医疗费用。武汉大学方面介绍,张在元人事关系不在武大,所以不享受校内教职工公费医疗,在这种情形下,武大为避免继续为其支付大额医疗费用,才选择在聘用合同到期后不再与其续签合同。

而对于张在元教授来说,由于其与武汉大学存在聘用关系,认为武汉大学会为其承担医疗费用,所以可能因此而没有参加医疗保险,而当他已经处于病危状态之中时,又不符合参加医疗保险的条件,这样一来,在武汉大学不再与其续签聘用合同情形下,张在元就可能面临无力承担医疗

费用的难题。这实际上也揭示出这样一个命题,即在当前事业单位进行人事改革、人事关系呈现多元化情形下,职工将自己的医疗保障完全寄托在工作单位身上是缺乏保险系数的。而对于国有单位来说,通过公费医疗方式全额承担所有职工的医疗费用也是一个沉重的包袱,甚至有时会将自己推入像解聘张在元教授这样面临舆论指责的尴尬境地当中。

所以说,武汉大学解聘病危教授一事实际上更是提出了一种警示,即医疗保障应该尽快实现从单位保障向着社会保障转化。对包括国有单位职工在内的民众实行统一的医疗社会保障,才能避免类似张在元教授这样因为被解聘而面临医疗费用难以负担的困境,同时也能使国有单位摆脱因为实行公费医疗所背负的沉重负担,同时还可消弭当前社会保障制度被分为三六九等的公正现象。

(魏文彪)

## 那些评比表彰是如何扰民的

【媒体思想之曹林专栏】

年终岁首,各类检查、考核、评比、达标、表彰活动接踵而至,让基层疲于应付。云南省近日专门下发通知,要求从即日起,除法律、法规规定和中央及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在云南开展的检查和表彰活动外,一律暂停各类检查、考核、评比、达标、表彰活动,切实减轻基层和群众负担。

(11月17日《人民日报》)以我对一些地方政府的了解,当地的检查评比如果不是泛滥成灾的地步,不是折腾得下面怨声载道,没有折腾出什么捂不住的丑闻,是很难惊动到省级政府专门下发通知一律叫停的。

都知道各类检查、考核、评估很扰民,比如教育部门

隔段时间就来一次的“高校评估”,评得高校鸡飞狗跳,把师生们折腾得人仰马翻,以至于当初中科大校长在炮轰评估时呼吁“予以休息三年,三年不评估,三年不开会”。比如“某某城市”评比,把一帮官员折腾得什么正事都不干,近乎疯狂地想着怎么迎合检查。高端的评比检查尚如此折腾和扰民,基层低端的更混乱不堪了。检查和评估扰民很容易理解,那评比表彰之类派发荣誉、让人皆大欢喜的活动,怎么就变成了扰民之举,让老百姓疲于应付、不胜其烦呢?评比和表彰,是这样扰民的。

首先,一次评比和表彰,就可能是一次对地方企业和大户的搜刮。为什么啊,办活动需要经费啊,评比和表彰需要资金啊,不然发什么奖、表什么彰。对此,主办这些活动的政府部门是肯定不会拿一分钱的,而是会让企业出钱赞助。志愿赞助也就罢了,很多时候是被逼无奈的“被赞助”,政府暗示了,领导开口了,企业和大户哪里有“说不”的勇气,只能掏钱免灾了。不仅赞助者要交赞助费,主办者要出主办费,参与者还要交参评费,获奖者还要

交评审费。

组织评奖和表彰活动的部门,很多时候根本就不是为了借此激励先进,而就是为巧立名目地敛财。政府部门不仅不会拿一分钱,而且还会借此创收——名义上是给企业和公民发奖,实际上创造机会给部门的兄弟们年终发奖开掘财源。舆论监督下,如果乱收费和乱罚款越来越难了,强制圈钱很容易被媒体曝光,许多部门就想出了这种体面的、名正言顺、颇有迷惑性的方式圈钱,大家都热衷于选择办活动来创造敛财机会。我所知道的,这甚至已发展成一种产业,有专门的掮客公司与政府部门合作举办这类活动,公司提成,部门盈利,官员分成,而公众则遭了殃,这不是扰民又是什么?

另一层扰民在于,为了给这类活动营造热闹的氛围,政府又喜欢将普通民众动员起来参与到活动中来,比如让小学生手捧鲜花欢迎领导,给单位下派参加活动者的指标,让人冒着严寒或酷暑给领导讲话鼓掌,还有载歌载舞、欢天喜地、锣鼓喧天等等——领导一般都喜欢热闹、热烈的大场面,喜欢被众星捧月、前呼后拥的氛围,尤其是在这种评比表彰活动中。官员的这种偏好,本就是一种扰民。为了满足领导的偏好,民众必定会被骚扰。

扰民还表现在,评比和表彰往往不是单调、单纯的发奖,与之相随的是一整套中国式的复杂繁琐的官场活动,有迎来送往,有领导考察,有同行学习,有经验介绍,有吃喝接待,有参观访问,还有其他的借机旅游,这对主办方无疑会是一种很大的折腾。

搜刮和扰民的评比表彰虽然被叫停了,但在部门利益化和权力趋利化的体制取向,任何活动都可能被操作为一场盘剥社会、骚扰民众的活动,权力的胃口绝不会因一个通知而罢休,他们一定会想出新的形式进行敛财和搜刮,这是一两个通知所无法解决的。(作者系《中国青年报》编辑)